

·函札整理·

傅增湘致缪荃孙未刊函札释读

严正道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致缪荃孙未刊函札五通，作于1917年11月至1919年8月间，函札内容除记载期间两人交往的一些琐事外，大都为古籍收藏方面的问题，如探讨古籍的版本鉴定、流传收藏、校刻出版等，亦涉及不少书林佚事，不但有助于二人生平事迹的考索，而且对于一些古籍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傅增湘 缪荃孙 函札

笔者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发现傅增湘致缪荃孙函札五通，于古籍版本鉴定、流传及校刻出版多有讨论，今按其写作时间顺次抄录并释读于下。

筱珊^①老前辈大人阁下：

出都时未得躬送，计抵府一切清吉，身体当已复元，至以为念。手教奉诵，久未得答为罪。所言三事亦领悉，朱侯仍旧，并未废，岳博士恐未必行。图书馆本应改办法，印臣^②自极相宜，惜其多病，不能日日到馆耳。式之^③在津，不入都，亦未便遥领，为会元^④所讥，容当相机为之。鄙意第一先将善本及普通书目编成，再议其余。午门二程化去贰万余元，湘看过决不

①筱珊，即缪荃孙字，又作小山，晚号艺风老人。

②印臣，即吴昌绶（？-1928），字伯宛，号甘遁，晚号松邻，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性嗜藏书，又善刻书，先后刻印过影宋、金、元、明旧本《双照楼词》14种，《松邻丛书》20种，以及宋、金、元、明、清著作《十六家墨说》。所刻皆精良，为世所重。

③式之，即章钰（1864-1934），又字坚孟，江苏长洲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曾任京师图书馆编修，清史馆编修。辛亥革命后，寓居天津，专事校书、藏书，著有《四当斋集》、《宋史校勘记》等。

④会元，指夏曾佑，浙江杭州人，时为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为光绪庚寅会元，以此代称。

能用,不如不搬之为愈,或不得已仍循文襄^①旧案,在高庙为之,特此时最极,尚说不到耳。有一事奉商,公藏书中时有推陈出新之举,宋元本不敢问,明本中有数种,不知公见让否,开如别纸,希示知。若仍留自玩,则不必言耳。近得抄本《前汉纪》、明抄《乐府古题要解》,皆致堂绍兴本,《南史》共得五卷,值百五十元。今又得弘治十二年本《陈后山文集》三十卷,王鸿濡刻(十一行廿字),亦至罕见,未知公曾见之否?叶焕彬^②刻书目见过否?其中误处甚多。此公于版刻乃外行耶?殊不可解,所谓庆历胶泥活字《韦苏州集》恐是明初活字,不然则太怪异矣。印臣近病甚,森玉^③临在秘书办事。专此敬请撰安。

晚生傅增湘顿首

十一月十五日

函开头言“出都时未得躬送”,知缪荃孙曾至京城,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缪荃孙至京,十月九日离京,时有“夏闰枝、顾玉溪、胡溶、董受经来送行”^④。不见傅增湘相送。又函中言“今又得弘治十二年本《陈后山文集》三十卷”,据《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后山先生集》三十卷题识记时间在丁巳(1917)^⑤,则可确定此函作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函中谓缪荃孙向傅增湘“所言三事”当与京师图书馆重开馆相关。一九一七年一月京师图书馆重新开馆,稍后傅增湘入阁为教育总长,而京师图书馆自一九一二年后就为教育部所接管,九月缪荃孙至京,当向傅增湘言及利用其教育总长身份安排吴昌绶、章钰入馆。据吴昌绶致缪荃孙函札言“闻图书馆归教育部某科,又闻是夏穉卿管。绶与夏虽同里,不相识”。^⑥夏穉卿即夏曾佑,一九一三年其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可见吴昌绶有意缪荃孙推荐其入馆,而缪荃孙转托傅增湘期望促成此事。不过,因吴昌绶长期多病,所以傅增湘最终没有应允,而章钰虽有京师图书馆编修的经历,但长期寓居天津,不能遥领,担心为夏曾佑反对,所以“当相机为之”。此为第一事。第二事,当指缪荃孙向傅增湘提出编订京师图书馆各种书目。缪荃孙为第一任馆长时曾编订过《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第二任馆长江瀚编订过《京师图书馆

①文襄,指张之洞,清朝政府决定设立京师图书馆后,即由他负责筹办,并亲自选定缪荃孙为监督(馆长)。

②叶焕彬,即叶德辉,一号郎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归乡。精于版本目录学,编有《郎园丛书》、《观古堂汇刻书》等,又著有《书林清话》。

③森玉,即徐森玉(1881-1971),浙江吴兴人,精通金石、版本、目录,曾任教育部金事和京师图书馆主任。

④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四》,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⑤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988页。

⑥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17页。

善本简书目》，但这并不能反映所藏图书的全部，如清政府档案文献、金石文献、敦煌文献、文津阁《四库全书》等，故有必要编制更为详细的书目。但开馆初始，事情繁杂，故傅增湘认为“现将善本及普通书目编成，再议其馀”。后夏曾佑在上述书目基础上重新核查，悉心厘正，上报教育部后编印成《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册。但傅增湘似乎并不满意，又亲招张宗祥编制善本书目。第三事，即有关京师图书馆的选址问题。一九一七年京师图书馆重开馆时，暂定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但地点并不合适，遭致众人批评。而后教育部又呈文大总统黎元洪，云：“兹有端门、午门一带地方，位置适中，门楼高敞，于设立图书馆，收藏阅览，均极相宜。”并“拟请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拨归教育部，略事修葺，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①获批准许。缪荃孙至京后，或许对上述选址不满，建议傅增湘可循“文襄旧案”，仍定在什刹海广化寺。傅增湘在具体考察后，对此虽然不是完全赞同，但对于前述教育部拟请午门楼则是十分反对的，即函中言“湘看过绝不能用，不如不搬之”。因此才会有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部议京师图书馆移设午门楼时，傅增湘以“连年战乱，地拒冲要，易遭燹毁，不如原址幽僻”^②的理由予以否定，此事遂罢。上述信函内容，是有关于国家图书馆馆史的重要资料，值得研究者重视。

函中所言《陈后山文集》三十卷本，《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三云：“明弘治十二年己未刻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阑。每卷首页三、四、五行题‘茶陵陈仁子同甫编校’、‘后学南阳王鸿儒懋学重校’、‘后学彭城马骥廷震绣梓’。前有山西按察使僉事王鸿儒序，略言‘此本录于仁和陈氏，谿守马君请录付梓，以无别本校正，讹字颇多，观者以意读之可也。其卷首载贱姓名，而题曰重校者，盖附骥之意，非事实也’。次有门人魏衍记，元城王云、天社任渊二跋，皆据宋时原刻传录。”^③根据以上著录，祝尚书认为王鸿儒所用底本“录自其家藏本，而其藏本又出自仁和陈氏。按编校人陈仁子，宋末元初人，著有《牧莱脞语》。因疑所谓仁和陈氏，即陈仁子后裔，其藏本为元刻（或源于元刻）。”^④与今存宋本相比，多出文十九篇。但如王序所言“讹字颇多”，却非自谦，且有脱文现象，傅增湘以何焯《后山集》校记校之，发现“差失至有百条许，其谬异之甚者，或误联二文为一首，或遗落字句至数百，败棘荒榛，触目皆是”。又此本并非完帙，缺四、五、六卷，傅增湘以邢之襄藏本影写补入。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又函中言“叶焕彬刻书目见过否？其中误处甚多”，叶德辉所刻书目，即一

①见《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呈请将端门一带地方拨归教育部设置京师图书馆文 1917 年 1 月 18 日》，载《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三期。

②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第 51 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695-696 页。

④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十二，中华书局，1999 年，第 593 页。

九一六年由其子叶启倬以活字排印出版之《观古堂藏书目》，以经史子集四部编排，每部为一卷，著录藏书近 5000 种。傅增湘所认为的“误处”，比较明显的有两处，一即函中提及的所谓“北宋庆历胶泥活字本”《韦苏州集》，二是所谓的明弘治十四年涂祯仿宋九行刻本《盐铁论》。关于前者，叶德辉《郎园读书志》云：“此北宋胶泥活字印本《韦苏州集》，字画横竖波磔皆有齿痕，盖由胶泥锻字，不如梨枣受刀之快利也。”“今海内藏书家，如山东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陆氏皕宋楼、丰顺丁氏持静斋，收藏号称极富，按其目录，皆无此种宋本。故以此书论，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①可以看出叶氏的自得之情，然其为宋活字本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据民国藏书家周越然言，此书一九三三年为其所得，原书中尚有无名氏所作一跋，对其版本进行了考证，跋云：“卷中尚存‘策斐轩藏书印’六字白文长方印一。按厉鹗《樊榭山房诗集·论诗绝句》注载宋绍兴二年《策斐轩刻词林韵释》一卷。阮文达《擘经室外集·进呈提要》，又以为南宋。予以北、南宋人诗集词集韵考之，实非宋人所用之韵，疑其书出于元明间书林之所为。以此书印记验之，更可证也。此种活字本，明锡山华氏会通馆亦有之，以锡作字，形体相似，然字体略长，又极草率，纸墨粗恶，格栏亦肥，以此较之，迥然不类，则此又可为考证古书之一助矣。”^②由于叶氏认定此书为宋本活字，故有意不提及此跋。因而傅增湘质疑其“恐是明初活字，不然则太怪异矣”，是有其依据的。而作为叶氏的老师，缪荃孙也颇为怀疑，据《艺风老人日记》一九一九年闰月五日记载：“昨夜刘翰怡来，言《韦苏州集》非宋，亦无确据。”^③近代文献学家如赵万里、张秀民等也都认为是明活字本。由于此书现已失传，故不能得出确切结论。关于后者，由于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刊本《盐铁论》极少见，世人视同宋本，故关于何者为涂祯本的问题叶傅二人争论很大。据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五，其判定自己所藏本为真涂本的依据主要是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中有关宋本《盐铁论》十卷的记载，以及书前都穆所作序言^④。由于其坚持己见，最终以其所藏本印入《四部丛刊》。而傅增湘当时只在缪荃孙家见过真涂本，不能确认，故在与叶氏的论争中落于下风，只能“惋叹而已”。若干年后，傅增湘收藏了各种版本，包括缪荃孙所藏本，仔细比较对照，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宋本不足据也”，二是“涂本不易见也”，三是“张本直翻涂本，无可疑也”^⑤，彻底否定了叶氏的观点，而确认缪荃孙所藏本为真涂本。

①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七，《湖南近代藏书家题跋选》，岳麓书社，2011 年，第 370 页。

②见周越然：《言言斋古籍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36 页。

③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四》，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 154 页。

④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七，《湖南近代藏书家题跋选》，岳麓书社，2011 年，第 224—225 页。

⑤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82—287 页。

小山老前辈大人阁下：

前函计登览。兹由友人处借得明嘉靖本《唐子西集》，未有黄尧夫跋，特抄呈一分，不定式之所辑稿本中有之否？希示知为要。又敝刻《方言》板尚存湖北，乞公随便写一函赐下，好托友人在汉取板寄京，以结束此事。游明《史记》新购得一部，缺十数卷，拟借前尊藏抄补，尚乞惠假为荷。专此敬请著安。晚生傅增湘顿首。十二月初五日

吴佩伯^①书全数售去，得现洋六千元，并闻。

函中言“兹由友人处借得明嘉靖本《唐子西集》，未有黄尧夫跋”，据傅增湘《唐先生集》跋云：“顷周叔弢世兄自南中归邨，示所得此明刻七卷本，发函展诵，惊喜过望。卷末有尧翁跋二则，叙此书源流至详。”^②可知《唐子西集》即此《唐先生集》。而跋末记时间为“丁巳（1917）十二月十一日”，则此函亦在此前后不久，故确定时间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宋本《方言》，傅增湘视为至宝，一生曾刊印多次。据其《藏园群书题记》言：“此书自明季清初历经名家收藏，嗣后沉埋不见者二百余年，归盛意园后亦刊而未传。今幸为余所获。既喜为天壤间孤本，未宜秘惜自私，又重以乡贤遗籍，为文字训故之书，遂锐志刊布，以公诸世。先付日人小林忠治郎精印制珂罗版百部，又经故人吴佩伯在天津官报局石印数十部，后属湖北陶子麟影宋刊板，登诸《蜀贤遗书》之首。未几，涵芬楼创印《四部丛刊》，又取宋本缩印，列入其中，从此千百本流行于海内外。”^③函中所言“又敝刻《方言》板尚存湖北”，即指陶子麟影宋刊板，由缪荃孙负责监督刊刻。缪氏于宋本《方言》亦极为关注，初傅增湘购得此书，欣喜过望，携至沪上以示缪荃孙，“艺风语余，意园得书后，王莲孙祭酒曾假得，影写付镌，持以示人，咸以其字如翰苑官体书，与宋本风格绝不类。莲孙惭沮，遂匿不示人。因纵臾亟为印行，公诸当世。”^④缪荃孙不仅极力“纵臾”傅增湘刊印，还亲自参与其中，由其联系武昌陶子麟镌刻版本。陶子麟者，清末民初著名刻工，尤以摹刻仿宋体为特长，在武昌设立刻书坊，专门接受当时藏书家委托的刻印业务。其与缪荃孙来往颇多，之前代为镌刻过《藕香零拾丛书》、《艺风藏书记》等，故缪荃孙选择陶子麟代为镌刻。然傅增湘似乎并不满意陶子麟镌刻之版本，欲另选北方刻工，致缪荃孙不满，这在两人的函札往来中有所反映，如傅增湘致缪荃孙函中言：“至刻书一层，晚前

①吴佩伯，即吴慈培（1884—1916），云南保山人。民国初年寓居天津，与傅增湘、章钰往来频繁。

②傅增湘：《〈唐先生集〉跋》，《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608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7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函亦只及陶刻之不合意,并未言《方言》之不用,只言将来拟令北方匠人试刻(亦指他书而言)。意欲别开一派,不过悬想之词,固未尝刻,亦未尝有匠人,以其皆在不可知之数耳。来函乃虚题实做,以致情事皆非,此乃晚不善措词,以致误会,幸恕宥为要。此书既刻成,万无不要之理,且留此别行,亦未尝不可。原书既在敝处,亦未便将刻板奉让,仍乞通知前途将刻值算清,以便归款。”^①最终此事以傅增湘的妥协为结束,仍由陶子麟镌刻完成。在刻版的同时,傅增湘又囑同乡老友王秉恩(字雪澄)作校记,附刻其后。函中言“取板寄京”,则此时当已完成刻版。

关于抄补游明本《史记》一事,早前缪荃孙藏有一残本,傅增湘曾商议从其购置,“游明《史记》既经配钞,如肯让时,似宜将配钞价加入。若公仍欲度藏,亦不敢请耳”。后又去函言:“游明本《史记》,如可照原价(五十金)惠让,即祈检交菊公并寄,以北方尚可觅它本钞配也。”^②但缪荃孙最终未售让,而傅增湘自己也购得一本,因此有借抄一事。此本虽源自元中统本,但刻版质量较差,傅增湘己卯(1939)所作杨绍和手跋本《史记集解索隐》题记云:“若此本字体散漫,刻工草率,决为明覆本无疑。余别藏有明正统时游明刻本,持与此本比较,其版式刻工正同,则决为游明本可知矣。”^③因而此版本的文献和收藏价值似乎要差一些。至于其藏存情况,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并不见载,或已佚失。

三

筱珊老前辈大人阁下:

自杭州回扬奉手示,敬悉带京之书,印臣已有函来。《阳秋》又收得明钞残本,乃下半也。《稽古日钞》存者有限,别纸录之。杭州得明正嘉间刻《义山诗集》,乃单刻本,极少见。又得明钞大字本《史记集解》,九行,行十五六字不等,皮纸润廉,极古旧,疑是宋纸,钞手亦在明初。《历书》第四后有官衔两行“左迪功郎充无为军军学教授潘旦校对 右承直郎充淮南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监雕”,此书似蜀大字本,而官衔乃淮南南路,岂该路曾翻刻耶?敬希考示(尚缺二十卷)。商务印《宋人说部》,见否?夏剑丞^④校书亦不甚内行也。专此敬请道安,晚生傅增湘拜启。

日内回京,复示寄京石老娘胡同可也。七月十五日

函末云“复示寄京石老娘胡同可也”,按傅增湘一九一八年始移至北京石老娘胡同定居,则信函最早作于一九一八年。另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

①《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80页。

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7、578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146页。

④夏剑臣,即夏敬观(1875-1953),又字鉴丞,晚号映庵,近代词学家。曾受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之聘,协助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

录》卷五《历代地理指掌图》不分卷（明刊本）注云：“己未夏得于杭州述古斋”^①，知傅增湘一九一九年夏在杭州。又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有记云：“接傅沅叔扬州信，即覆去。”同月二十六日“沅叔在扬州，有信并寄《韵语阳秋》次册。”^②以上事实正与函中所言相符，则此函作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无疑。

《阳秋》，即《韵语阳秋》，宋葛立方撰。据《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一生曾反复校订过《韵语阳秋》，最后一次在一九一九年，缘于傅增湘至江浙访书时无意所得一影宋抄本。据其《艺风藏书再续记》言：“今日傅君沅叔在扬州收得一钞本，先寄函来，云得一影宋本《韵语阳秋》，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七字，高七寸四分，广六寸一分。中卷有相连属者。余向沅叔借来。系其子谦问鄯于临川郡斋刻本。取以校对，方知钞本之佳。”^③由于此本最佳且难得，缪氏不顾身体有恙当天即校完卷一，其时在六月十七日（见《艺风老人日记》）。而后傅增湘返回扬州继续访书，又得明抄残本，故以此信告之。此明抄残本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查傅增湘所撰题识以及其它各种古籍书目亦不见有明抄残本著录，或已不存。又傅增湘藏有日本写本，从宋刊影出，“十三行二十七字。前隆兴元年八月武夷徐林序，次立方自序，次乾道二年沈洵序，次淳熙六年侄葛郊序。钤有广东肇阳罗道关防，又日本‘佐名文库’大印。”^④与缪氏所校影宋本又不同，或与此明抄残本同源。缪荃孙所校本今存重庆市图书馆。

《稽古日钞》，即《稽古堂日钞》，明高承埏辑刻。高承埏为明末藏书家，“家藏书八十椟，与项氏万卷楼争富”。^⑤其所刻《刘宾客嘉话录》等被叶德辉认为是“明人刻书之精品。”又叶德辉云：“所刻书又有唐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李浚《北窗续录》，梅彪《石药尔雅》，元尹世珍《娵环记》，高德基《平江纪事》，唐姓佚名《灌畦暇语》，明陈继儒《偃曝馀谈》、《墨畦》，袁宏道《关中游历》等书，总题《稽古堂日抄》，见顾修《汇刻书目》。以不见于诸家书目，附记于此。”^⑥叶德辉以上所列《稽古堂日钞》书目只有十种，实际有十七种，另七种为钱易《南部新书》、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刘餗《隋唐嘉话》、冯贽《云仙散录》、康骈《剧谈录》、费昶《梁溪漫志》、上官融《友会丛谈》。就笔者目前所见各种古籍书目，并不见有完整本《稽古堂日钞》存世，且残本也存世甚少，故傅增湘、叶德辉二人皆不约而同重视此书。而据《藏园群书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中华书局，2009年，第329页。

②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四》，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44、147页。

③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校本第五》，《艺风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5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中华书局，2009年，第1322页。

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83页。

⑥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岳麓书社，1999年，第105-106页。

经眼录》卷十一记载,傅增湘所得《稽古堂日钞》为扬州书估陈韞山持来,时间在己未(1919),因其少见,遂收之,可知同样得之于扬州访书期间。然只残存六种,为“明刊本,八行十六字,均题‘明樵李高承埏寓公较’或‘明寓公高承埏较’字样”。^①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高承埏还有《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存世,收书二十一种,共七十九卷,查检相关书目,实际只比《稽古堂日钞》增加了《子夏易传》、《江淮异人录》、《温公史劄》、《袁石公遗书》四种,应是在《稽古堂日钞》基础的上续刻而已,故程有庆先生认为“此书即是《稽古堂群书秘简》的残本”^②。《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现存北京市文物局。

《义山诗集》,查《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有“《李商隐诗集》六卷”题识,云“明刊本,九行十九字,版心题‘义山’二字,审其字体,当为明嘉靖时刊本”。^③题记时间为己未七月十二日,即此版本。关于此版本的具体情况,这里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是关于此版本的来源。从傅氏所描述情况看,此版本亦即刘学锴先生《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一文中所言之“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毗陵蒋孝刻《中唐人集十二家》本《李义山诗集》六卷本”^④,而据刘学锴先生的考证其更早的祖本“可能就是《直斋书录解題》所著录的《李义山集》三卷本”。二是关于傅氏题记之误。题记言此版本“九行十九字”,然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则云“明刻本,四册,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记相同,那么何者有误呢?据刘学锴先生言四部丛刊本《李义山诗集》即据此明刊本影印,笔者查核四部丛刊本,确为“十行二十字”,则傅氏所记“九行十九字”有误。

《史记集解》,《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言“己未六月南游,文友堂魏经腴函告,旋寄样本书来,因属出重价收之”。^⑥亦得之于江浙访书时。此本实为明人影写本。函云“尚缺二十卷”,《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题识同,然据其《藏园群书题记》则缺二十一卷,分别为“《本纪》六卷(缺卷三、四,卷九至十二),《表》二卷(缺表一、二),《世家》十三卷(缺三至八,十至十三,十七至十九)”^⑦实存一百零九卷。函中又云“此书似蜀大字本,而官衔乃淮南路,岂该路曾翻刻耶”,颇存疑问,而在庚辰年(1940)其题写跋语时则如此释疑,“余考大字本《史记集解》其存于今世可考见者,……翰怡藏本为吴平斋故物,卷帙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789页。

②程有庆:《〈稽古堂群书秘简〉与〈玄怪录〉十一卷本》,《文献》,1991年第1期,第272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911页。

④刘学锴:《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第446页。

⑤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078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142页。

⑦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9页。

最多,亦只存四十五卷。然最可贵者,其中有十数卷确为蜀中刻本,其余各卷及各家所藏,均淮南路所覆板也”。^①认为是将蜀大字本与淮南路刻本两者汇辑而成。其实并非如此,其原因则要从明清时藏书家就常将淮南路刻本误为蜀大字本说起。淮南路刻本九行十六字,与蜀本刻书行格极相似,故易被误为蜀刻本,对此康有为曾辨正云:“世所传蜀大字本《史记》,误也,自毛子晋辈已言之。然蜀只刻五经,无《史记》,世以大字本皆归之蜀耳。此本(即现藏上海图书馆之《史记集解》残本三十卷)既归杨惺吾,据宋讳定为孝宗时刻,则非蜀本矣。惺翁尚徇俗说,题为宋蜀大字本,似为不词,但直称南宋本可宝知矣。且其刊写之精,纸墨之雅,古色古香玩之无斁,实为稀世之宝,何必蜀!”^②从康有为之辨可知,其实所谓《史记》蜀大字本皆后人讹传,实际只有南宋淮南路刻本一种,对此研究者已有具体考证^③。大约傅增湘也未细辨,至有此疑。

四

小山老前辈大人阁下:

连奉手示,敬悉《阳秋》首册及书影均收到,其下册得信希付还。《儒学警悟》已劝兰泉^④收之,刻成即赠二部,公似可不必抄副也。《中州集》元本在授金^⑤处见之,晚拟留藏,以元著各种皆有旧本,独缺此耳,其值八月节前奉上,想不误。顷见一明抄本《夷坚志》(要贰百元)分十集,与清平山堂本同,但文字颇有异(次第同),有人校过,实明人卷后或添数条,则清平本所无也。公于此书致力甚勤,曾见有明抄本否?晚则以为此最善也。明抄本《史记》已购得,价百十元,尚欠廿卷,可谓贵矣。公谓其为宋刻,见《容斋》何笔、何卷,乞示悉范本。侍有钱牧斋校本,但校例不明耳。手此敬请道安。

晚生傅增湘拜启。闰月十二日

函中言“明抄本《史记》已购得”,知此函作于前一函之后不久。又函末题为“闰月十二日”,一九一九年恰闰七月,故此函作于一九一九年闰七月十二日。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9页。

②郭立暄等整理:《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③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1-198页。

④兰泉,即陶湘(1871-1940),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著名藏书家、刻书家。编有《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版书目》、《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等,以及刻印《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丛书。

⑤即董康(1867-1947),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曾赴日本访书,著有《书舶庸谭》,记录其访书经历。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广川词录》等,刊刻都非常精良。

《儒学警悟》，南宋俞鼎孙、俞经辑，收书六种四十一卷，其中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十卷，程大昌《演繁露》六卷，马永卿《懒真子》五卷，程大昌《考古编》十卷，陈善《扞虱新话》八卷，俞成《萤雪丛说》二卷。此书成于嘉泰壬戌（1202），早于左圭《百川学海》七十余年，故被缪荃孙视为古今丛书之祖。此书与缪荃孙渊源颇深，据缪氏言其最初关注《儒学警悟》始于编订《石林燕语辨》。因《石林燕语辨》不见原书版本流传，清人胡珽所辑主要来自《永乐大典》所引《儒学警悟》，故欲寻《儒学警悟》对校，然查相关公私书目皆阙如。本以为此书就此散佚，然“光绪壬辰（1892），有书贾自山西得《儒学警悟》全编六册，内有嘉靖壬辰吉庵王良栋录藏题识一行，明钞明装，特来求售，则汪辨十卷在焉。议价未成即为宗室伯羲祭酒购去，向伯羲借观，伯羲钞畀一帙而未许见原书”^①。缪氏为此耿耿于怀。直至民国元年盛伯羲所藏遗书散出，遂托傅增湘寻访此书下落，据傅增湘言“艺风闻之，驰书属余物色《儒学警悟》所在。时宋元刻本之有名者，率为朋辈分携以去，此书以名字黯淡，巍然尚存于宏远书肆，乃以重价收之。书留案头数月，嗣以事至海上，因携致焉”^②。傅增湘在致张元济函中言“《儒学警悟》十册（实为六册），赵贾意在售百元以外。不知小山尚欲得之否。此亦罕见之品。老谭死后，其书卖否尚不可知，然前议一单（公处有此单），如照原价愿卖，亦只得留之”^③。可见其原欲劝张元济购入，张表示同意。又《艺风老人日记》一九一三年元月二十五日记载：“撰《儒学警悟》跋。菊生（即张元济）送《儒学警悟》及《后村集》十册来。”^④书或最后由张元济转交缪氏。历经数十年，一朝得遂其愿，缪氏自然“忻喜过望”。其后数年间缪氏又耗费大量精力校勘此书，最后在一九一九年秋交由陶湘付梓。函中所言“《儒学警悟》已劝兰泉收之，刻成即赠二部，公似可不必抄副也”，当指此事，又据函中之意傅增湘或在其中努力促成陶湘同意刊刻。不过，陶湘刻成此书则是在三年后，而缪氏已逝，不免令人吁嘘感叹，如陶湘序中言，“缪艺风先生卒于己未十一月初一日，年七十有六。是书校毕在戊午（1918）冬间。己未中秋前三日，并撰序一篇，手授于湘以付梓。时先生已卧病两月，今岁工竣，先生已归道山三载矣，为之泫然”。^⑤缪氏在将校本交由陶湘刊刻的同时，由于版本的珍贵，傅增湘欲“与世人共之”，有意再校勘刻印此书，“兰泉闻之，慨然引为己任，乃

①缪荃孙：《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俞鼎孙、俞经《儒学警悟》，中华书局，2000年，第5页。

②傅增湘：《校刻〈儒学警悟〉跋》，《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8页。

③《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7页。

④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

⑤陶湘：《校刻〈儒学警悟七集〉按语》，俞鼎孙、俞经《儒学警悟》，中华书局，2000年，第9页。

举艺风所校,就商于余,因为检索群书,参订各本,正其讹误,补其脱逸。自开梓以迄断手,凡阅六年,而艺风已墓有宿草,不及见矣”。^①因此又有了一九二四年陶湘的翻刻本。而傅、缪二人对此书的珍视,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惺惺相惜情谊也成为书林的一段佳话。

需要说明的是,明写本《儒学警悟》在陶湘刊刻后,又为东莞莫伯骥所得,据其所作题跋云:“此为宋人所编,盖丛书初祖也。清季发见孤本,近年遂有刊行,兹为刊本所自出。盖明嘉靖间精写,而江阴缪氏朱笔手校者也,末有江安傅氏墨笔题语。此书著录缪氏《艺风堂藏书续记》卷五,题识颇详。其后武进陶氏刻之,而原日祖本遂归吾家。”^②后五十万卷楼藏书归于国家图书馆,此书随藏于国图。

关于《中州集》,传世有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蒙古宪宗五年(1255)乙卯新刊本,一种是元至大三年(1310)平水曹氏进德斋递修本。函中言“《中州集》元本在授金处见之”,当指后一种。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九《题元刻本〈中州集〉》云:“其刊本流传最为罕秘,据何义门校本所记,汲古阁所藏只有壬、癸及闰集三卷,高阳许氏只有甲、乙二集,近世瞿、陆两家藏有元本,丁氏则为弘治本。此本卷帙特为完具,余得之缪艺风前辈,艺风得之蒋香生凤藻家。世传毛斧季在都下得蒙古刊本,为东海司寇豪夺以去,今验卷中铃印及书篋篆刻,知此本即斧季所收,健庵所夺者也。”^③可知傅增湘得之于缪氏,又《艺风老人日记》一九一九年七月三日记云:“又托《中州集》带与董授经。”^④则缪氏将此本置于董授金处为傅增湘所见,才有向其购置之事。另题记中言徐乾学(字健庵)豪夺之事,见何焯《义门先生集》卷九《跋〈中州集〉》所载^⑤,然言此本为蒙古刊本则以讹传讹。所谓“蒙古刊本”即乙卯新刊本,此原本仅见于日本,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曾从日本影印复制,由线装书局2002年出版。另有日本五山覆刻本,傅增湘曾收藏,题识云:“余别藏有日本五山版翻刻版,其首题正为‘乙卯新刊’四字,是此书初刻当为乙卯新刊,其后版归坊肆,重印行世,特改题此名,以耸人耳目,冀广流布耳。”^⑥则蒙古本与元刻本不能混为一谈,傅增湘未加详察矣。又据傅增湘题识,元刊本原缺《中州乐府》一卷,所补正是取自日本五山覆刻本。此元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①傅增湘:《校刻〈儒学警悟〉跋》,《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9页。

②莫伯骥:《〈儒学警悟七集〉四十卷题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5页。

④《艺风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四》,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⑤《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5页。

缪荃孙于《夷坚志》，用力最勤，这不仅是因为其卷帙浩繁，更因为其版本繁杂。张元济涵芬楼本《夷坚志》跋云“江阴缪小山前辈尝取黄氏旧钞校正吕、周二本”^①，但未言其以清平山堂本校勘，《艺风老人日记》及《艺风堂藏书记》亦不曾提及此版本，但据函中所言则似以此本相校过。至于傅增湘向缪氏推荐之明抄本《夷坚志》，《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云：“分类卷数与明刻清平山堂本同，疑明本即出于此也。有人以墨笔校过，并以墨笔添补各条于卷中。卷首田汝成序后人补加入者。钤有‘绛云楼藏书印’朱文长印。按：此潍县高翰声家藏书，余得之保古斋老殷手。”^②知与清平山堂本同源，且经钱谦益收藏过。而“疑明本即出于此”，其证据主要是因为“其甚于清平者甚多”（见下函），而据涵芬楼本《夷坚志校例》言“所补廿五卷，则以叶祖荣分类本（即清平山堂本）为之主，而辅以明钞本”^③，则以明抄本对校过，而从所作校记看明抄本确比清平山堂本更优，为其祖本似乎是可信的。但缪荃孙身体不佳，不久病歿，无缘以此本参校，实为憾事。

五

小山老前辈大人阁下：

奉示敬悉，兹由中原（？）银行先上洋叁百元，祈查收。明抄本《夷坚志》细肩（肩？）甚好，乃绛云楼藏，即分类本，分十集（甲至癸）五十一卷。与清平山堂本校，其胜于清平者甚多，又有前人以朱墨笔校过，加入各条，似可备公之考证也。刻《儒学警悟》据印臣言不过半年耳，《留真谱》复刻者如有散叶，亦可见赐示。专此敬请台安，晚生傅增湘拜启。八月初一日。

菟跋刻好，盼寄一分。

苏州书估杨馥堂^④今年九月七十寿，印臣及晚等为诗以寿之，公与之亦有交，则请赐一诗何如？册页后寄上。

艺风老人 湘上

据函札内容知此函作于前一函之后不久，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

《留真谱》，杨守敬编。“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书摹刻一二叶，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⑤始于其随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受日本藏书家森立之启发。初编完成于一九零一年，共十二册，二编完成于一九一七年，共八册。函中所言复刻者，当指其二编。缪荃孙、傅增湘都非常重视此书的价值，并

①见何卓点校：《夷坚志·诸家序跋》，中华书局，1981年，第1843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中华书局，2009年，第665页。

③《夷坚志校例》（涵芬楼本），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④杨馥堂，苏州书商，逝于抗战前。初以贩卖碑帖为主，后兼营古书，书室名鸣琴室。傅增湘曾从其购得善本书数种，如洪武本《苏州府志》，元刻本《李太白集》，莫祥之刻本《乖崖集》等。

⑤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岳麓书社，1999年，第287页。

有意仿此再编,据叶德辉言“缪艺风先生亦有续刻,未竟,已归道山”。又言“往年内阁中藏书并归京师图书馆,其残叶为书估所得,好事者每收买之,积成巨册。傅沅叔所获尤多,中多藏书家自来未著录之版本。余忝惠沅叔摹印传之,是亦足供好古书者一啖之尝也”^①。然叶德辉所言不确,今国家图书馆等藏《宋元书景》即缪荃孙所编^②。至于傅增湘,从函中可以看出其也似有意为之,但最终不见其整理汇编,原因已不得而知。

堯跋,即《堯圃藏书题识》,缪荃孙编。缪荃孙自光绪丙子(1876)始收集黄堯圃题跋,历四十余年,广泛搜罗,随得随记,又得章式之(钰)、吴印臣等人相助,共计六百二十二篇,编为十卷,“而重刻之金陵。始丙辰,迄己未,始成。另辑刻书跋一卷,附后。”^③据《艺风老人日记》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记载:“又发姜文卿信、章式之信。寄《堯圃题跋后序》。”^④知刻成于四五月间,故傅增湘函中求寄一份。又《艺风老人日记》最后一日即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记载:“接傅沅叔、授经信,黄跋解决矣。”则傅增湘在缪氏逝前已收到此书。

【作者简介】严正道,男,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献。

①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岳麓书社,1999年,第288页。

②见稻畑耕一郎:《〈宋元书景〉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

③缪荃孙:《堯圃藏书题识·序》,屠友祥校注《堯圃藏书题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④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四》,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